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

第五卷

主编：汤应武

缪晓敏

目 录

发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1)

- 广大干部、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拨乱反正
-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
- 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坦诚直言
- 邓小平阐述实事求是,批驳“两个凡是”
- 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
- 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
- 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拉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序幕 (28)

- 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
- 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新变化
-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 突破了原定议题的中心思想
- 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
- 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 改革开放的呼声和酝酿调整方针
- 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法制和民主建设

邓小平拍板与高考制度的恢复 (68)

- “文革”十年,大学的门是紧闭的
-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 1972 年周总理提出恢复考试招生制度
- 1977 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会议
-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
- 许多著名科学家大力呼吁招生制度改革
- 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 邓小平批评教育部个别领导裹足不前
- 1977 年几百万学子参加了高考，盛况空前

政策调整与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 (84)

- 上山下乡步履维艰，出现“四不满意”
- 农场人满为患，要求停止增人
- 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上山下乡不是长期办法
- 李先念说：“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
-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引起的波澜
- 中央批转会议文件，知青工作局面面临新转折
- 政策的调整，亮起终止上山下乡的红灯

邓小平点“将”与荣毅仁“出山” (121)

- 十年浩劫使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同样遭到劫难
- 邓小平与叶剑英、王震商讨重新使用原工商业者
- 邓小平的邀请令荣毅仁等五位老人兴奋不已
- 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 邓小平说：“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 “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合同”

胡耀邦等主持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 (126)

- 1977 年初冬中央组织部院内鞭炮轰鸣
- 中组部干部欢迎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上任

- 发挥中组部的职能,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 《组工通讯》发表《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 真理在手,所向披靡,正是胡耀邦本色
- 六项措施,三个要求善始善终抓好落实
- 为数百名省部级干部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三千余件
- 为有全国影响的集团性案件平反
- 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妥善处理历史积案
- 有错必纠,为外国专家落实政策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172)

- 中央成立了彭真主持的审判工作领导小组
- 首先解决立法问题使审判工作取得合法地位
-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成立两高特别检察厅和法庭
- 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
- 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
- 起诉书的稿子反复修改三十次
- 将讯问各个主犯和旁证案犯情况作了电视录相
- 到秦城监狱观察受审主犯
- 1983年1月25日两审正式宣判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策…………… (218)

- 艰难的突破,安徽人敢为天下先
- 摆脱困境的最初尝试,省委《六条》的诞生
- “与其撂荒,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
- 肥西历尽艰辛的“包产到户”
- 凤阳的大包干,小岗的秘密协议
- 邓小平肯定安徽省委《六条》,四川省委制订《十二条》
- 万里说:就全国来说,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
- “阳光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万里公开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首肯安徽

○党中央做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策

兴建宝钢决策的酝酿与拍板..... (247)

○陈云向李先念、谷牧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邓小平向稻山嘉宽解释宝钢拖期问题

○陈云建议:宝钢一二期建设可适当拖开间距

○1979年5月31日陈云到上海,进行调查

○陈云主张: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中央常委圈阅中财委关于宝钢的报告

○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

万里抓农业五年五个中央1号文件..... (258)

○万里调中央后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

○杜润生受命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万里说:离开了8亿农民,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万里提出要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

○5个中央1号文件是万里主管农业期间制定的

○万里说:这是在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下取得的

○邓小平在南巡中说:农村改革万里是立了功的

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272)

○1979年3月中央下决心用几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

○这一方针的背景是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

○当时贯彻这一决定相当困难,意见不太统一

○1980年4月姚依林接任国家计委主任

○薛暮桥写了一份书面意见给姚依林

○中央的决定是继续贯彻调整方针

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 (279)

- 世界各国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汇报
- 中央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负责提出具体方案
-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
- 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率先改革的报告
- 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江泽民率团出国考察
- 改革中出现了“蛇口模式”和“深圳速度”
- 邓小平为深圳、珠海、厦门特区题词
- 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决策

邓小平主持制定《历史决议》..... (294)

- 邓小平说:为了“使大家的认识一致”
-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 “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 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出了两条意见
- “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 “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
- 邓小平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

确定《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305)

- 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路线斗争等术语
- 对毛泽东的哲学贡献不能贬低和随意提高
- 为什么“左”的错误常发生且长期占主导地位
- 如何从理论上说明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的转化
- 如何从理论上讲清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 如何理解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历史只能答复条件已经成熟了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334)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都有贡献

○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否定毛泽东思想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中央决定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347)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

○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继续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对 1977、1978 年经济冒进负有重要责任

○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呢?

○胡耀邦说: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

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364)

○第二代领导核心是历史形成的

○深受毛泽东和党中央器重的“副帅”

○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

○邓小平复出和展开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再一次复出和拨乱反正

○对第一代领导核心作出科学的历史评价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格局的特点

确定干部新老交替和设置顾问委员会 (380)

- 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没有解决
-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强调要选好接班人
- “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 邓小平指出:要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
- 五中全会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 邓小平推举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
- 1980年8月中央考虑成立顾问委员会
- 邓小平、陈云出任二届顾问委员会主任
- 十四大决定不再设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

下决心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391)

- 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初步酝酿
- 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机构逐渐恢复
- 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初步恢复和加强
-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恢复
-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 逐年改革和建立国家领导体制
- 改革专政机构和干部制度
-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 党的十三大郑重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用“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422)

- 《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有九篇文章谈到香港问题
- 1978年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
- 国务院港澳办组织了专门班子进行调研
- 1981年公布“香港九条”已有“一国两制”的意思
- 基本法共160条,是香港问题的具体化和法律化
- “一国两制”决不是权宜之计

- 为台湾回归提供了一个蓝图
-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为主体
- 防止对“一国两制”的破坏
- “一国两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充分发挥政协参政议政功能..... (430)

- 邓大姐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 邓颖超提出“牵牛要牵牛鼻子”
- 邓颖超说:“整党决不会导致专断、压制和动乱”
- 彭鸿文说:“邓大姐说的都是老实话”
- 邓颖超十分关心政协委员的工作和发展
- “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为保护改革开放作出“严打”的决策..... (450)

- 1983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与刘复之谈话
- 邓小平说:“‘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
-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 “严打”的巨大效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 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 “严打”要为改革开放服务
- 刘复之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谈话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发展..... (458)

- 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出科学论断
-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 1982年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
- 中苏两国多次磋商,清除障碍
-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 对“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的反思

○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发展

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与百万大裁军 (466)

○邓小平感叹：八十岁的人检阅部队是个缺陷

○新华社报道：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要对军队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邓小平对机构臃肿提出严肃批评

○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合并

○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国家基建工程兵撤销

○“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昆明军区被撤销引起军内外震动

薄一波谈整党的决定和部署 (480)

○全国的整党工作历时三年基本结束

○这次整党实际上是分三期进行的

○整党有成绩，而且一期比一期好

○整党有失误，原因比较复杂

○整党避免了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左”的做法

○整党注重了同改革、同经济工作的关系

○整党的后期，又出现几股新不正之风

○整党应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两个基本点，相互统一，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决策 (493)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抓紧调查研究

○经济研究中心同体改委组织体制改革研讨会

○对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的研究

○对价格体制、外贸体制、企业工资的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全面承包 (534)

- 企业放权改革从四川开始经历了两个阶段
- 1979 年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政策
- 1987 年后开始大规模推广承包制
- 小型企业租赁制改革的逐步推广
- 企业间横向联合与企业集团的形成
- 公有制条件下的企业兼并开始起步
- 深圳、上海等地证券市场的初步探索
- 股份制的试点和各地的积极参与

发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 广大干部、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拨乱反正
-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
- 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坦诚直言
- 邓小平阐述实事求是，批驳“两个凡是”
- 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
- 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
- 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 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在举国欢庆胜利、揭批“四人帮”之际，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尔后是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进行拨乱反正，这种要求在政治方面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实际上，这两个要求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揭批“四人帮”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在当时还颇为敏

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问题,牵扯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严重挑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步调一致的领导人在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容许、鼓励人们揭批“四人帮”,但不容许人们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1976年10月下旬,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上,华国锋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花圈、诗词和标语。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也反映着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然而,当时中央某些负责人的态度却与此格格不入。当《人民日报》就周总理逝世1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时,汪规定只准发4、5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泽东审查过的。与此同时,当《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时,汪东兴批示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华国锋的注意,但他却背离了人民的愿望。1月下旬,在按他的意图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发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与此同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之一李鑫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的矛头是对着谁呀?要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当天的《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首都其它报纸同日,全国其它报纸随即也以同样的规格转载。这篇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它以在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形式出现,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事实上,它与华国锋等人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整个抓纲治国的态度和方针:一切都不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还要按照以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这里有必要说明,这篇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这3个单位的负责人未闻其事,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也不甚明了。当时的宣传口负责人耿飫事先就毫不知情,并曾反对发表。实际上,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修改、汪东兴拍板的。

1977年3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14日,华国锋发表讲话。在谈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其中谈到邓小平同志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却解释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他还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

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接着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认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告诫大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的上述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虽然已经有了松动,即认为邓小平有功有过,适当时候要出来工作;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其根本态度没有变化,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在讲话中,他重申肯定“文化大革命”是7分成绩,3分错误。他两次表示并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说明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坚持“两个凡

是”的方针的。

与华国锋等人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的要求,对为进行这项工作设置障碍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斗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尽管华国锋一开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但并未奏效。13日,陈云在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同时提出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的发言更为尖锐: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斗争,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实际上揭开了中央内部拨乱反正的序幕。

邓小平,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几落几起、不屈不挠的政治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两个凡是”的方针盛行一时,老一辈革命家及觉悟群众的正义呼声受到压制时,邓小平又一次挺身而出,并且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坦率直指问题的要害。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5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实际上成为全党解放